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信任的道德基础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美】 埃里克·尤斯拉纳 著
张敦敏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LINE OBSERVING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信任的道德基础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美】 埃里克·尤斯拉纳 著
张敦敏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LINE OBSERV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任的道德基础/[美] 埃里克·尤斯拉纳著; 张敦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04-5887-8

I. 信… II. ①尤…②张… III. 信任—道德—基础
VI. Q981.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836459 号

图字:01-2004-5882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颀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将此书带着我的爱
献给我心爱的乐观主义者和信任者
戴比、埃弗里和阿贝儿。

（分别为作者的妻子、儿子和爱犬。——译者注）

前 言

本书酝酿已久，它体现了我日常研究工作中的曲折道路，也体现出我本人思想的演变。我写作的内容大多数是关于美国国会的。1993年，我发表了一部著作，题为《和谐气氛在美国国会中消退》（*The Decline of Comity in Congress*），这部著作把国会中越来越多的不文明的行为和美国公众中信任的衰退联系起来了，其中，信任是合作精神的代名词，而对更深的意义，我很少思考，即使它在我的分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二年，B. 普特南邀请我出席一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学术会议，地点在风景宜人的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Cape Cod）。被邀请的人可以偕配偶前往。由于这是我和妻子为人父母以来第一次有机会离家旅行，所以我们渴望前去。但是，由于我不曾在社会资本方面做过任何工作，因此我必须相当迅速地熟悉这个话题。我遵照一句古老的格言：“写你知道的事情”，于是，我研究了“社会普查”中的诚信问题，写出了一篇论文，把信任他人与各种人们所希望的态度和行为联系起来了。这就使我离开了仅集中于国会的传统研究项目。

对于更深入的论述，我仍然知之甚少，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些对这篇论文的良好反应，因此，我决定继续深入研究这种联系。

我写了一篇题为《信仰、希望和仁慈》的文章。这是我的被引述得最多的未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之所以一直未发表，部分的原因是我采取了一种异端的立场：我认为，信任是公民参与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什么是信任。我相信，信任能够解决公民参与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很严重，威胁着我们的民主秩序。有人写书论述国会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和全面的僵局，对于他们来说，有关我们社会的警示性信号似乎就像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

我取得了进展。信任是重要的。我之所以确定这一点，因为信任是一种道德价值。引自 G. 卢里著作中的文字武装了我，我因此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部分，公民参与是它的一个重要结果，但对公民生活参与并不属于社会资本。可是，一些刊物评论家告诉我，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信任更像是公民参与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部书稿使我处处都能找到自我，我很快认识到，我在某种基本方式上是错误的，但在另一种基本方式上我是正确的。我的正确之处在于我认为信任是一种价值，它并不是简单地由经验塑造的，它所产生的后果远比公民参与后果深刻。我的错误是，参与了“是什么构成了社会资本”的辩论。我从《信仰、希望和仁慈》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经验使我相信，玩弄定义的游戏是愚蠢的。当时我出席过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的学术会议，会议在不同的地点召开，如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米兰、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Cluj - Napoca），在这些地方，我至少花了一整天辩论什么构成了社会资本。

即使那些不关心此事的读者也会注意到，我在文章中很少提到“社会资本”。这不是疏漏；它反映出吃到苦头以后得到的教训。我曾重新定义专业词汇和花费大量时间倾听他人，但付出的

努力却是做重复性的工作，并为此受到连续打击，在此之后，我决定集中在我所感兴趣的内容：信任。因此我的思想开始集中，并且开始进行分类：什么样的内容可以纳入对信任是一种道德价值这一观点进行的论证，以及从这个观点出发会引出什么结果。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认识到，信任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开始质疑信任和大多数形式的公民参与之间的联系。普特南认为，信任和公民参与构成了“良性”循环，我一开始对这个观点是接受的，但后来就离开了。

我一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信任第一，公民参与随后，这个观点目前仍受 D. 施托勒的极力提倡。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阅读和思考有关各种不同形式参与的论述，我对信任和公民参与之间联系的怀疑也就越来越多。当我看到普特南在自己的新著中，把他的论证又扩展到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时，我的怀疑就加倍了。其实，我们中很少有人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公民群体或者社会交往方面。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在多数情况下也只是与我们相同的人待在一起。回想我的先前的那本书《和谐气氛在美国国会中消退》，我认识到信任有助于解决我们与意见不一致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但我们与这些人可能很少有共同点。不文明的行为不论是在国会还是在整个国家中的增长，都起源于我们想把自己的对手妖魔化的愿望。

在 R. 哈丁著述中所涉及的那种信任，即信任我们认识的人，似乎远离这些被关注的问题。哈丁的许多精彩例证只涉及信任我们所熟知的人。我对他的例证思考得越多，就越使我相信，这些例证其实无非就是相信自己妻子这类司空见惯的问题。然后我又思考了我认为不值得信任的那些人，并且产生了疑问：我对他们的轻视是否会使我重新看待一切人。于是我向人们提问，如果我走到他们跟前揍他们的脸，他们会不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

大多数人都以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但他们都承认，这种偶发事件不会使他们成为厌世主义者。

这就是我思想旅程经过大大缩减的故事。在这个旅程的沿途，我得到了许多恩惠。其中最主要有，马里兰大学综合研究委员会（General Research board）颁发给我的杰出教师奖学金（Distinguished Faculty Fellowship），这个奖项给了我从1997年至1998年的一整年的假期进行阅读、写作和思考这些问题；有E. M. 德克森美国国会领导作用研究中心（Everett McKinley Dirksen Center for Study of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颁发的津贴，它帮助我思考与国会的联系；还有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的支持，它帮助我执行了这个研究项目。

许多人和机构提供的数据使我的分析研究得以进行：政治和社会研究的大学校际联盟（the Inter - 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为本书提供了大多数数据；提供数据的单位和个人还有：《华盛顿邮报》的R. 莫林；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的A. 赫夫龙和A. 霍尔茨；人与媒体佩尤中心（Pew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的A. 科胡特；美国慈善联合总会（United Way）的R. 奥康纳；美国集资委员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nd - Raising Councils）的A. E. 卡普兰；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的P. 伊尔博和R. 汤普森；《纽约时报》的M. 卡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CBS News）的J. C. 佐乌；盖洛普国际（Gallup International）的M. 詹姆斯；国际社会调查规划（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的R. 乌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2000年初步调查（the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2000 Pilot Study）的人员D. 金德、N. 布恩斯、A. 格罗斯和P. 吕瓦诺，其中的调查内容

有，就信任、乐于助人和公平等问题“说出你的想法”；国民意见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 P. 博瓦；R. 拉波尔塔；D. 特雷斯曼；J. 费德科；康涅狄格大学罗珀中心（through the Rop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 R. 普特南；这些机构和善良的人们对我所做的任何解释都不承担责任。

我尤其感到受恩惠于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对于我的书稿，他们给予了充满智慧而又详细的建议，尤其是 J. 曼斯布里奇、J. 蒙达克、B. 罗斯坦、D. 施托勒和 M. 瓦伦（按照字母排序）。还有更多的人们，他们对我的书稿中的某些较小的部分以各种形式做了评论，其中有些人还在谈话中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他们是（按照字母排序）：G. 阿尔佩罗维茨、G. 伯德斯库、S. 贝内特、V. 布雷恩韦特、J. 布雷姆、G. 布伦南、M. 布朗、D. 宗、R. 康利、E. 考克斯、S. E. S. 克劳福德、K. 达维沙、P. 德克尔、K. 多尔蒂、J. S. 德雷泽克、R. 埃斯科利、M. 菲奥里纳、F. 福山、G. 加姆、J. 金佩尔、M. 格雷伯、R. 哈丁、J. 哈特、J. 霍克希尔德、V. 霍奇金森、M. 霍赫、R. 安格哈特、T. 耶伦、R. 约翰斯顿、K. 考夫曼、R. 金、R. 克利特贾德、A. 克里希纳、J. 莱利、M. 利瓦伊、P. 莱文、R. 莫林、J. 米勒、K. 牛顿、J. 奥尼克斯、J. 奥本海默、J. 欧文斯、M. 帕尔丹、A. 普罗丁斯基、S. 普拉卡什、R. 普特南、E. 奎因 II、P. 克森伯里、W. 拉恩、L. 罗宾逊、N. 罗森布拉姆、T. 桑特麦尔、K. L. 施洛茨曼、P. 塞莱、M. 西莱斯、K. 苏丹、S. 塔尔哈米、J. 德斯、J. 惠利、P. 怀特利、R. 威尔金森、R. 沃尔芬格、D. 沃尔贝克、R. 乌斯诺和 Y. 伊沙伊。

同时，在许多学术会议上，我还受益于与会者所做的评论，包括美国政治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和

中西部政治学协会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举办的许多会议, 由于会议众多, 我不能一一记录下来。在国内, 这些会议、单位和个人包括: 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受众; 由堪萨斯大学 R. J. 多尔研究所发起的、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文明举止和慎思”会议 (the Conference on Civility and Deliberation in the U. S. Senate sponsored by the Robert J. Dole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世界银行; 在乔治敦大学召开的“民主与信任”学术会议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cy and Trust, Georgetown University); 由 A. 伊兹欧尼组织、在弗吉尼亚的水晶城举行的“社群主义高峰会议” (the Communitarian Summit organized by Amitai Etzioni in Crystal City, Virginia);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美国国务卿公开论坛 (the Secretary's Open Forum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纳博格传播学院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资本研究组 (the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杜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校区的亨德里克斯研讨会 (the Hendricks Seminar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incoln); 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举行的社会资本和民主研讨会 (the Workshop o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Cape Cod, Massachusetts); 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单位, 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ollege Park) 的讲演会。

在国际方面, 我也从学术会议的与会者们学到了许多, 其中有欧洲政治学研究协会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在米兰召开的会议和在英格兰的沃里克 (Warwick) 以及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办的研讨会。在挪威的苏尔斯特兰 (Sol-

strand) 举行的学术会议上, 我还荣幸地展示了我的发现, 这次会议的组织单位是; 挪威组织和管理研究中心和挪威的权力与民主研究组 (the Norwegian Centre for Research in 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Norwegian Power and Democracy Project)。我还受益于荷兰海牙的社会与文化规划局、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巴贝什·鲍里亚大学 (Babes - Bolyai University, Cluj Napoca)、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文化基金会、在英国伦敦的西敏寺大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技术大学, 以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the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Mexico City, Mexico)。

同时, 我还感恩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好人们, 尤其是 L. 贝特曼和 M. 莫斯卡蒂, 他们一直关照着 my 的书稿, 从审读一直到出版。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 我那永远充满信任感的家庭经受了时间的消耗和各种干扰。埃弗里 (Avery) 在书稿完成时是 11 岁, 现在已经长大了, 能够理解我为生活所做的事情, 但难于全面地理解。戴比是一个典型的信任者, 她所经受的这部手稿带来磨难如此之多, 以至于她说都能编成电影了, 而且我们还有了这部电影的最新情节。阿贝儿是我们从金毛寻回犬救助、教育和训练中心领养的, 我在修改书稿时, 它总是在那里睡觉, 有时, 它也企图扑向我的电脑, 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落在了我的身上。即使是最顽固的厌世者的心也会被他们带来的欢乐所温暖。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信任与良好的生活	(1)
挑战常规智慧	(4)
信任的各种方式	(10)
前面的路	(13)
第二章 策略信任和道德主义信任	(17)
信任的变种	(25)
信任与经验	(27)
你信任谁?	(30)
普遍信任和个别信任的世界观	(38)
信任与公民参与	(44)
信任与国家	(49)
重申	(55)
第三章 计量信任	(64)
普遍信任和个别信任	(65)
信任的稳定性	(70)

信任问题	(82)
前边的路	(90)
第四章 信任的根源	(97)
信任和乐观主义	(101)
美国人的乐观主义	(105)
个人的幸福与环境的支持	(107)
信任的其他基础	(109)
信任的人口统计学	(112)
信任、社会网络和父母对子女的教养	(116)
信任是否就等于乐观主义?	(120)
是什么塑造了普遍信任?	(124)
普遍信任与实际生活	(135)
信任的类型	(141)
第五章 信任与经验	(148)
闲聊爱好者和成大事者	(153)
社会交往是否导致信任	(155)
信任与组织生活	(159)
生产和消费信任	(164)
行善与信任他人	(170)
伸出手来接触他人	(176)
从我们认识的人到陌生人	(180)
信任他人与信任政府	(185)
重申	(197)
第六章 信任的稳定与变化	(208)
信任的持久性	(211)
信任的形式在变化	(214)
婴儿潮的急速发展	(221)

博爱与平等	(231)
重申	(239)
第七章 信任与结果	(248)
信任为什么重要?	(252)
信任及其整体感	(255)
信任与日常生活	(257)
信任衰落的结果	(258)
信任衰落的其他结果	(268)
信任与统治	(270)
信任的后果	(273)
第八章 信任及其民主的气质	(283)
为民主的三声欢呼?	(286)
信任和经验	(289)
各种文化中的信任	(296)
什么是不重要的	(304)
信任在各国的结果	(307)
结束语 信任和公民社群	(324)
信任与文化	(327)
建立信任	(330)
附录 A	(333)
附录 B	(337)
附录 C	(343)
人名译名对照	(346)
参考文献	(352)
译后记	(384)

第一章

信任与良好的生活

办公室工作人员萨利·福思说：“拉尔夫，我不能相信真的是你拿了约兰达的椅子。”

办公室的管理人员拉尔夫说：“别这么说，萨利，她要在国外待六个月呢。她用不着这把椅子。而且她那么相信别人，连门都不锁，这难道是我的错？”

萨利：“可我发现你的门却上了两道锁。”

拉尔夫：“是啊，我知道我处在什么环境中。”

——摘自连环漫画《萨利·福思》^[1]

信任是社会生活的鸡汤。它带给我们各种各样好的事物，从参与社群生活的愿望到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达到对政府表现的满意（Putnam, 1993, 1955a; Fukayama, 1995; Knack and Keefer, 1997）和使日常生活更加愉快。但也和鸡汤一样，信任的作用是神秘的。我们似乎只能在我们认识的人中间建立信任。但当我们相信陌生人时，信任才能带来好处。

信任陌生人就意味着接受他们进入我们的“道德共同体”。陌生人也许看上去与我们有所不同，他们可以拥有不同的意识形

态和宗教。但是，我们相信，有一些基本的价值是共同的。因此，相信他人并不具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拥有共同的命运，那些陌生人不大可能滥用我们的积极态度。由于大家都意识到有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因此即使是在陌生人之间也易于产生合作（参见 Putnam, 1993, 171）。信任是通往合作的道路（Levi, 1999, 14），但还不止于此，以信任为基础的协议可以持续得更长久，而且也不必在每一步都反复协商。当我们信任他人时，我们是在期望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这既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过去通常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Gambetta, 1988, 217；Hardin, 1992），也是因为相信，如果我们认为他人值得相信，我们会生活得更好（Baier, 1986, 234；Pagden, 1988, 130；参见本书第二章）。如果我们信任他人的原因是这两个中的任意一个，我们就不必把每次合作的良机当作一次新的决策来面对。

当我们感到我们与他人有共同的命运时，我们就会以其他一些方式面对他们。当我们与我们信任的人交往时，看到他们遇到的困难自己不能克服，我们就感到难受。因此，信任他人的人会寻求改善他们较差的生活，或者支持政府做出计划，纠正不公平的情况，或者做得更到位，给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由于陌生人是否值得信任这个问题是没有证据作为基础的，因此必须有其他的基础，我认为就是道德基础（参见 Mansbridge, 1999）。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即他人与你共有一些基本价值。他们不一定与你在政治和宗教上一致，但在某些基本的层面上，人们都接受这样的观点：人与人之间被普遍地联结着，这种联结使人与人之间必须有合作。而这种共同联结的基础是对人的本性的设定：世界是一个仁慈之地，组成这个世界的人们都有着良好的意愿（因此是值得信任的）。各种事物也都像这个世界一样美好，而且越来越好，而我们也能够使

世界越来越好（见第二章和第四章）。我们相互之间都承担着义务。

信任的道德基础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认为值得信任的人们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必须比合作更多。对于陌生人、对于与我们有区别的人，我们必须持积极的看法，而且必须认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对他人承担的义务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社群中参加慈善工作，尤其要参加慈善捐献和志愿贡献时间的活动。信任者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有些人具有一些优势，而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情况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见第七章）。

同时，它也意味着，信任并不包治百病。信任的道德主义基础所起的作用是，把我们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联系起来了，而不是那些我们已经了解的、或那些相似于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们加入了与自己有相似利益和背景的人组成的团体，就一定比待在家里更有信任感。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信任能导致我们参加诸如政治活动那样的冲突性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信任者就是参与者（Rosenber, 1956; Lane, 1959; Putnam, 2000），但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印象才是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印象是不对的。信任要解决的问题大于让人们同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它把我们与那些和我们没有交往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更大的问题，如在私人 and 公共范围内帮助那些较贫困的人，以及使政府工作得更好。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有着某种联系，并且我们对他们的命运承担着道德责任，我们就会认识到，信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理想。当我们认真地对待他人的道德要求时，我们就会对他们平等相待。等级观念与道德主义的信任是对立的。信任的文化依靠这样一个理念，即穷人的情况将会